流动性视角下地方污名的形成机制[1]

黎耀奇，曾馨莹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珠海 519082）

摘 要 地方被污名化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损害了地方形象以及相关群体的福祉，阻碍了社会平等、和谐与稳定。已有研究多采用故事性叙事去解释地方污名，但对于为何以及如何形成地方污名尚不明晰。本研究拟基于流动性视角，以地方刻板印象为核心，提出地方污名形成机制的研究构想。具体地，本研究先依据地方性冲突事件将地方污名划分为道德、治安和环境三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揭示要素流动在地方污名形成过程中的潜在影响，建构地方性冲突事件对地方污名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预期研究有助于加强对地方污名的理解，补充已有研究在地方污名形成机制上的研究缺口，并为缓解地方污名泛化的现实问题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地方污名，负面刻板印象，流动性，故事性叙事

分类号 B849；C913.9

1 问题提出

地方污名是与地方相绑定、关乎地方声誉的负面叙事，反映了社会公众对地方的负面刻板印象（Pinkster et al., 2020; 刘必强 等, 2022; 黎耀奇, 邓巧巧, 2023）。地方被污名化的现象在国内外都不鲜见，如巴基斯坦奥兰吉镇的贫民窟 、曼谷的红灯区、广西巴马的癌症村以及广州的巧克力社区。地方污名严重损害了地方形象，地方污名的内化则影响了相关群体的身份认同与心理健康（Guo et al., 2023; Hollinsaid et al., 2023;

收稿日期：2024-10-18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2371242）

通信作者：曾馨莹, Email: zengxy73@mail2.sysu.edu.cn

King et al., 2024），不利于社会平等、和谐与稳定（Sisson, 2021）。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发展，地方被污名化的现象不断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愈发严重，甚至已经出现了泛污名化的苗头（Durand & Vergne, 2014）。针对此现象，学界对地方污名的关注日益增强，已经成为当前学界的研究前沿和重要议题（Pearce, 2012; Makki & Vuuren, 2017）。

地方污名的讨论阵地主要还是在西方学界，国内关于地方污名的研究相对较少。在西方学界的现有研究中，地方污名通常被看成是一种既定的社会事实和地方意义（Kelaher et al., 2010; Schuster & Majidi, 2015; Tyler & Slater, 2018; Tran et al., 2020），仅强调了地方污名作为结果的存在。这种重结果、轻过程的研究导向，使得相关研究集中在关注地方污名对当地居民、地方景观、街区治理等方面的社会文化影响上（Wacquant et al., 2014; 尹铎 等, 2019），并倾向于从一些宏观的叙事逻辑展开解释。这种研究导向有助于通过强调地方污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激发学者们对该主题的重视，但难以完全解释地方污名的潜在类型划分与形成原因，以至于地方污名的形成机制仍处于未知状态。

流动性是地方污名形成的重要背景，也是加剧地方污名的程度与影响的催化剂，为讨论地方污名的形成机制提供了一种动态的、过程性的、关系性的研究视角（Adey, 2017; 朱竑 等, 2019）。流动性是当今社会的存在状态和社会事实，展现出不同时空中物质信息相互交织和杂糅的过程，并描绘了社会空间由相对固定的结构状态转变为流动易变的结构形态的特征（孙九霞 等, 2016）。人、物质、信息等多种要素的流动与交织促使地方的社会文化处于流动之中（孙九霞 等, 2016; 朱竑 等, 2019 ），不仅加深了地区间的差异，还使得文化碰撞和社会冲突的可能性不断增加。伴随这些碰撞与冲突，地方的意义和内涵被不断地扭曲和再建构，从而引致地方被污名化。此外，信息要素的流动速度在社交媒体时代下更快，这会促进地方负面信息的发酵，从而加剧和扩大地方污名的影响和程度（宋璐瑶, 2020）。可见，流动性是探索地方污名的形成机制所

必不可少的研究视角。

基于此，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基于流动性视角，探讨地方污名的形成机制与边界条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理论上，有助于深入理解各种要素的流动在地方污名形成过程中的显著作用，既补充已有研究在地方污名形成机制上的研究缺口，又为地方污名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实践上，可以为地方污名的治理方案提供指导，助力于社会精神文明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地方污名的研究进展

社会学家 Goffman 最早提出“污名”的概念用以阐述个体身份受损并遭受歧视的现象（Goffman, 1963）。现有污名研究集中在性别（如 Baiocco et al., 2020; Puckett et al., 2020）、职业（如 Li et al., 2020; 季浩 等, 2021; 王红丽 等, 2022）、疾病（如 Best & Arseniev–Koehler, 2023; Liu et al., 2024; Ocampo et al., 2023）、种族（如 Loury et al., 2003; Loyd & Bonds, 2018; Hernandez et al., 2016）等主题，相关学者从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地理学等领域对污名问题产开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是围绕“人”展开，以“地方”为对象的污名研究尚未得到以心理学为代表的学科领域的重视。地理学者发现地方也存在被污名化，进而提出“地方污名”的概念用以描述地方遭受负面声誉和负面地理想象的现象，并主张地理学者应寻求其背后的文化地理解释（Bush et al., 2001; He et al., 2022）。经历十余年的发展，特别是 Sisson 于 2021 年在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上发表以地方污名为主题的文献综述后（Sisson, 2021），地方污名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地理学界的关注，成为污名研究的重要前沿和议题。

目前已有研究大多来自于国外地理学界，讨论了城市边缘社区（如澳洲的 Blockies）、移民和少数族裔群体居住区（如荷兰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环境污染地区（如日本福岛）等不同类型的地方污名（Bush et al., 2001; Makki & Vuuren, 2017; Cairns, 2018; Pinkster et al., 2020）。然而，这些研究均是将地方污名看作是既定的污名

结果，并倾向于从道德地理（空间道德秩序）（Slater & Hannigan, 2018; Pinkster et al., 2020）、地理想象（Pinkster et al., 2020）、空间不平等（Keene & Padilla, 2010; Pearce, 2012）、关系地理（Cairns, 2018）等宏大的社会空间逻辑解释其本质。例如，Makki 等学者将地方污名看成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结果，指出了其背后隐含的社会阶层分化、不同价值观体系碰撞等现实问题（Makki & Vuuren, 2017）。诚然，这些研究的确有助于批判性地理解社会不平等所导致的地方污名问题（Graham et al., 2016; Paton et al., 2017; Verdouw & Flanagan, 2019），但难以从心理与认知视角揭示地方污名的类型划分与形成过程。

相较于国外研究，国内针对地方污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关注国家污名、疫情相关的地区污名等宏大议题（施诚, 倪娜, 2020; 李晓明, 2022）。例如，部分国家企图凭借其话语霸权将新冠疫情的起源定位到中国境内，从而塑造“中国病毒”的污名（李晓明, 2022）。当然，亦有一小部分研究关注到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地方污名问题（宋璐瑶, 2020）。相关研究以东北和河南为研究对象，识别了居民素质、人文环境、旅游环境、治安与经商环境等潜在因素对于地方污名的影响（宋璐瑶, 2020）。但总体来看，国内研究过于宏观且也未揭示地方污名的微观形成过程及内部差异，亟需寻找合适的视角对地方污名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总的来说，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地区污名研究，都忽视了地方污名在心理与认知层面上的形成机制，而这恰恰是解决地区污名问题以实现社会和谐目标所必须探索的。

2.2 地方刻板印象与地方污名

刻板印象是对群体、职业与地域等对象有较为固定且普遍的信念，人们在谈到这些对象时会不自觉地联想到相关的属性或事件（Boysen et al., 2022; Motro et al., 2022; 王祯, 管健, 2024）。刻板印象作为一种简单的认知加工过程，形塑了整个社会的观念与行为（王祯, 管健, 2021）。个体对他者的刻板印象存在积极与消极之分，它简化了

认知资源的需求，从而使信息加工更为快捷（Gershman & Cikara, 2023），但也可能会产生刻板印象威胁从而给某类对象的心理与行为产生负面影响（Spencer et al., 2016; Liu et al., 2021）。

地方刻板印象则是指人们关于某一地方及其要素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评价或行为预期，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对固定的认知图式（Reed, 1991; 孙国辉 等, 2019; Essien & Rohmann, 2024）。积极的地方刻板印象会促进地方的进步与发展（孙国辉 等, 2019; Feng et al., 2022）。反之，消极的地方刻板印象是地方在治安环境、居民行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结果，会扭曲地方在公众眼中的形象、降低地方吸引力与竞争力、激化地域间的冲突与矛盾（李航宇 等, 2014; 王祯, 杨丽娴, 2018）。不仅如此，消极的地方刻板印象还会溢出至与地方存在密切联系的群体。Kelaher 等（2010）就发现住在被污名化地区的居民也会被施加负面刻板印象，而 Levin 和 van Laar（2006）提到个体感知到他人对其的负面刻板印象后，会对自己所具有的相关特征或属性而感到羞耻。

地方刻板印象是污名产生过程的核心要素。Link 和 Phelan（2001）提到，当同时存在贴标签、负面刻板印象、社会隔离、地位丧失和歧视时，污名则会产生。社会公众会给某一类别贴上不受欢迎、不被认可的相关标签，而被贴上这些代表负面刻板印象标签的对象会被视作外群体，经历地位丧失与歧视，引致不公平的结果（黎耀奇, 邓巧巧, 2023）。要注意的是，只有负面的刻板印象才能成为污名产生过程中的核心要素（Andersen et al., 2022）。当对某一区域的负面刻板印象被社会主流文化中的群体成员所认可并分享时，该区域就会逐渐被污名化和边缘化（张明 等, 2020; 张光磊 等, 2022）。尽管刻板印象在污名产生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但心理学界对地方刻板印象及其对地方污名的影响机制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

2.3 流动性视角对地方污名研究的启发

流动性指代当今社会超越静态、不断变化的社会形态，流动性视角是一种认识和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孙九霞 等, 2016）。已有研究关注了流动过程中人作为流动主体

对于外部环境的感知，及其所产生的复杂情感与意义（黎镇霆, 刘晨, 2022; 张彤 等, 2023）。流动性范式主张以动态的视角去审视和理解要素流动过程中产生的地区差异、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张彤 等, 2023）。在流动性范式下，地方社会并非亘古不变，而是处于动态的社会建构和文化变迁过程中（马凌 等, 2017; 朱竑 等, 2019），任何形式的地方建构则都是建立在与外界的广泛联系之上的（钱俊希, 安宁, 2021）。流动性分析框架为分析地方污名的形成提供了逻辑起点。地方污名处于广泛联系的社会空间中，是观察者对地方的想象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只有依靠动态的、联系的、过程的视角才能揭示地方污名形成的深层逻辑与内在机理。可见，流动性视角恰好能够为分析地方污名的形成机制提供动态性研究视角和过程性研究方法，可以破解地方性事件是如何演变为集体层面的地方污名。

人口流动所引致的地方想象与地方意义发生改变是地方污名形成的重要诱因。随着人口的跨地方流动与迁徙，人们携带着原先迁出地所塑造的个性特征和文化观念，不可避免地与迁入地的文化环境产生交流和碰撞（Yan et al., 2017）。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人往往扮演着迁出地文化身份和地方形象的代言人，他们的形象、行为和所发生的事件，均会引发其他人对迁出地的地理联想（Bush et al., 2001; Conradson & Mckay, 2007），进而成为对迁出地进行道德判断和文化认同的依据。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不可避免地引发外来者与本地人之间的社会文化冲突，若冲突未能得到有效协调，可能会引致地方意义的扭曲与文化认同的缺失（Greiner & Sakdapolrak, 2013; 孙九霞 等, 2016; 朱竑 等, 2019），进而产生负面的地方刻板印象。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流动性让经济社会和文化风貌上的差异暴露在表面（Yan et al., 2017），但这不意味着负面的地方刻板印象与地方污名是一个必然结果。区域的发展程度会影响人们对文化差异的接受程度与社会冲突的容忍程度，进而影响人们对地方性冲突性事件的理解与评价。

信息流动是造成地方污名泛化现象的一个关键因素。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不断加速的信息流动扩大了地方性冲突事件的传播速度和范围，使得社会公众对地方的认

知与评价更容易从个体层面上升至集体层面（Li et al., 2020）。社交媒体为了扩大事件的传播，也会不遗余力地去促进信息流动（宋璐瑶, 2020）。当然，社交媒体的行动也并非总是生效的，因为公众对不同类型的媒体会有差异化的信度，对不同形式的报道也有着不同的偏好。这意味着媒体的类型、报道时间以及叙事方式都可能会影响到集体层面的道德判断与评价。

综上分析，地方污名的形成机制是现有研究未解决但亟待探索的研究议题，流动性为解决该议题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理论视角。本文将从流动性的理论视角出发，剖析地方污名的具体类型、厘清地方污名的形成机制及其边界机理。

3 研究构想

已有地方污名的相关研究大多将其视为既定结果，采用宏大的视角去解释这一现象（Bush et al., 2001; Makki & Vuuren, 2017; Cairns, 2018; Pinkster et al., 2020），缺乏从微观心理视角对地方污名的类型及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流动性视角认为人、物质、信息等要素是不断在流动的，使得整个社会也处于不断被建构的动态过程中（孙九霞 等, 2016; 朱竑 等, 2019）。从流动性视角出发，地方性冲突性事件会引发从人到地方的道德推断与评价，这是地方污名产生的源头；媒体对冲突性事件的传播与渲染会促进负面信息的流动，这是地方污名加剧的原因。当然，并非所有地方性事件都会引致相同的地方污名，也并非所有与冲突性事件绑定的地方都会被赋予相同程度的地方污名。因此，本文依据地方性冲突事件划分了地方污名的类型，提出了流动性视角下地方污名的形成机制的研究框架（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具体而言，本文引入地方刻板印象的中介机制，以及地方特征（如地方经济水平、地方多元性）和媒体报道（如媒体类型、叙事方式）的边界条件，认为地方性冲突事件会通过影响对地方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引致地方污名，而地方特征与媒体报道则会削弱或增强该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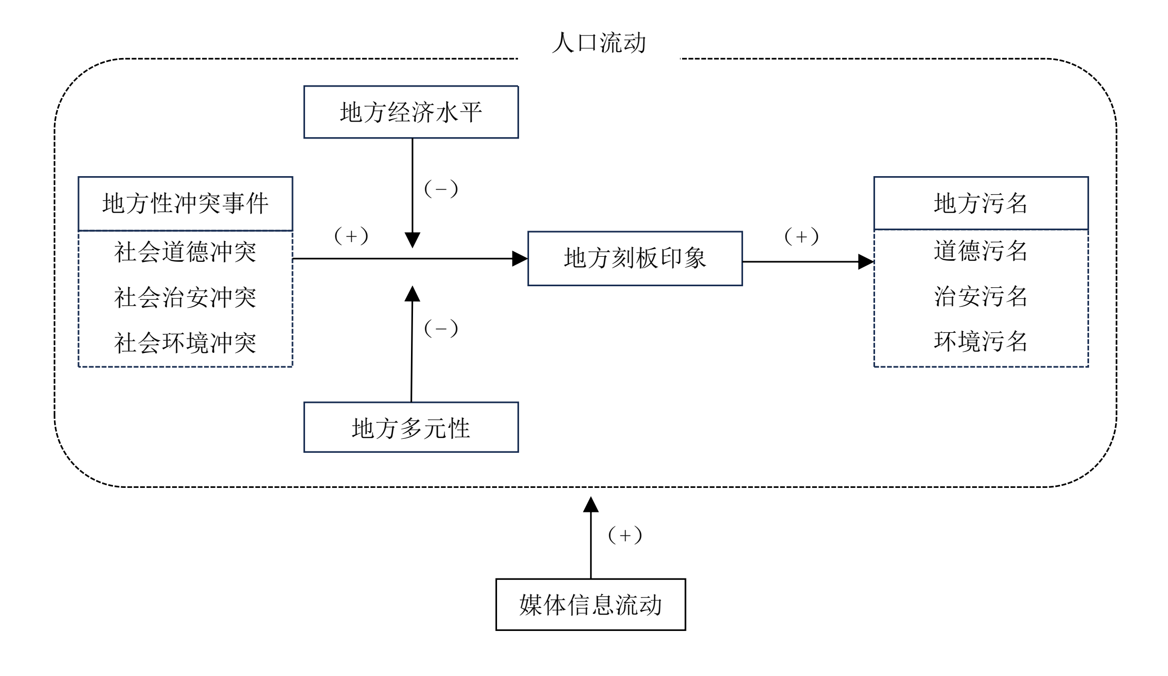


图 1　流动性视角下地方污名的形成机制

3.1 地方性冲突事件对地方刻板印象与地方污名的影响

地方性冲突事件是那些与特定地区紧密联系起来的社会、文化与环境冲突，具有很强的地方特征。本文将地方性冲突性事件分为社会道德冲突、社会治安冲突、社会环境冲突这 3 种类型。社会道德冲突是指由于文化背景、宗教信仰或社会规范的差异导致的与道德判断相关的冲突。来自不同地方的群体在价值观、习俗规范与道德标准上存在矛盾，从而对某些行为的正当性有着不同看法（Mohd Yusoff et al., 2022），如婚嫁习俗、饮食习惯、宗教行为等。社会治安冲突是指由于地方利益、社会治理不当或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等原因，出现的暴力事件或其它违规、违法行为（Leeds, 2008），如旅游景区宰客、强买强卖甚至是暴力打人事件。社会环境冲突一般源于不同群体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和实际状况之间的差距，某些地区环境脏乱差、卫生条件恶劣的情况并不鲜见（Chakrabarty, 1991）。这些冲突性事件损害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丑化了地方形象、降低了投资吸引力，长期来看不利于地方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

当地方频繁发生某种类型的冲突事件时，地方会被动地与这类冲突事件绑定在一起。人口迁徙将地方性冲突事件的相关信息流动至各地，引发社会公众对地方及其相

关要素的想象，给该地方贴上相关的负面标签，即对地方有负面刻板印象（Link & Phelan, 2001）。这些负面的地方刻板印象会影响人们的认知、情感与行为（陈赛 等, 2023），若没有加以有效的干预，则很容易就会发展为污名（黎耀奇 等, 2023）。一方面，负面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便难以消除，因为公众看法具有固定性与滞后性（Charlesworth & Banaji, 2022）；另一方面，负面标签代表地方及其要素有着不受欢迎或不被认可的特征，所以被贴上这种标签的地方会被主流群体所歧视（Link & Phelan, 2001; 黎耀奇 等, 2022）。甚至于，来自该地方或生活在该地方的人也会受到这些负面标签的影响，从而被赋予独特的空间身份（Hernandez et al., 2016）。这种空间身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不光彩的烙印，他们会因为这种身份归属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是被主流群体所隔离，逐渐丧失社会地位（Makki & Vuuren, 2017）。必须指出的是，地方被赋予的污名类型与频发的冲突事件类型是分离不开的，人们会分别赋予发生社会道德冲突、社会治安冲突、社会环境冲突的地方以道德污名、治安污名、环境污名，并且地方污名类型之间是不相冲突的，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可能被赋予多种污名（Ashforth & Kreiner, 2014）。综上，本研究提出了以下命题。

命题 1：地方性冲突事件会带来消极的地方刻板印象。

命题 2：消极的地方刻板印象会引致地方污名。

命题 3：地方性冲突事件通过消极的地方刻板印象进而诱发地方污名。

3.2 地方经济与地方多元性对地方污名的影响

流动性会加剧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多元程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也会逐渐固化为一种社会规范（游家兴 等, 2018; Zay Hta et al., 2024），从而影响公众对地方及地方上所发生的冲突事件的接受度。本研究重点关注了地方经济与地方多元性对地方污名的形成过程的影响。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一定的矛盾与冲突，这被认为是获取经济效益所难以避免的（Datta, 1973），因而社会公众往往对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方有着更强的包容度。此外，经济发展与制度、文化、环境等方面紧密联系（Hoff,

1998）。经济发展水平高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地方在这些方面的潜力，所以公众对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区域也会有着更高的预期，相信其有足够的能力去解决这些矛盾与冲突。可以预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发生地方性冲突事件时，公众会将此视作短期性且可被解决的矛盾，不容易发展成稳定存在的负面刻板印象。

相似地，地方多元性也会影响地方污名的形成过程。地方多元性是指地方在种族、语言、民族、宗教和移民等方面的开放程度（Harries et al., 2019）。多元性强的地区流动着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宗教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这种多样性在带来文化与思想碰撞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冲突与矛盾（Magee & Massoud, 2011）。这些区域所发生的冲突性事件可能被视作多元文化共存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并不会被认为是根深蒂固的矛盾的集中体现。并且，多元性强的地区通常拥有更加完备的信息传播渠道（严鹏, 2023），一旦发生不可预料的地方性冲突件时，能够及时地向外界解释冲突的背景以及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从而减少外部观察者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猜疑与不信任。因此，我们推断社会公众对多元性强的区域会有更高的包容度，即使发生地方性冲突事件也并不会直接给其贴上负面标签，对地方产生负面的刻板印象。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4：地方经济对冲突事件的负面效应发挥调节作用。相对于经济发达的区域，经济欠发达区域发生冲突事件更容易诱发公众对地方的负面刻板印象，从而赋予地方污名。

命题 5：地方多元性对冲突事件的负面效应发挥调节作用。相对于多元性强的区域，多元性弱的区域发生冲突事件更容易诱发公众对地方的负面刻板印象，从而赋予地方污名。

3.3 社交媒体对地方污名的影响

随着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媒体采用多种渠道促进了信息的流动与传播，其影响

跨越了地域与文化的限制（Lu et al., 2019）。媒体在此过程中充当了社会监督者的角色，对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论，揭露了社会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自媒体的出现降低了媒体发布信息的门槛，经常通过加大对事件的渲染去获取流量（游家兴 等, 2018; Li et al., 2020），对判断的客观性产生了重大影响（McCombs & Shaw, 1972; Lu et al., 2019）。但总的来说，不管是通过何种渠道，媒体信息作为一种公共话语形式，引导着公众对事件的判断与评价，深刻地影响了社会认知与价值取向（Li et al., 2019）。媒体对地方性冲突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论，促进了舆论的发酵也加速了负面事件的传播，让更多人能够接收到有关地方的负面信息，媒体态度甚至还会直接影响到公众对于地方冲突事件的看法。此外，媒体本身具有一定的互动性和参与性，为个体评价上升为群体认知的污名化过程提供了信息流动渠道（黎耀奇 等, 2022）。

社会公众作为媒体信息的接收者，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媒体类型与叙事方式对其认知过程的影响。具体而言，官方媒体拥有政府公信力作为背书，所发布的内容更具客观性与权威性，从而使公众聚焦在事件本身而非上升至对地方的看法。相反地，自媒体缺乏政策的约束，容易在利益和流量的驱使下，发布具有渲染性或偏离真相的报道与评价。侯为刚（2022）发现官媒与自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会带来不同的情绪反应，官媒相较于自媒体能够为公众带来更多安全感。可以推测，官媒越早报道冲突事件，越能够平息公众的负面情绪，而自媒体越早报道冲突事件，更容易激发公众的负面情绪。即使官媒事后进行一系列补救，但由于公众先入为主，很难再改变其认知。此外，许多媒体为了迎合受众需求采用故事性报道，难以把握事件的真实情况，造成部分报道失衡的情况；反之，客观性报道摒弃标签化，从事实出发做出客观判断。田瑾（2017）以“天价彩礼”为例阐述了客观性报道对于化解社会情绪与社会矛盾的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推断故事性报道促进了信息的片面传播，更易导致公众因认知偏见而对相关地方赋予地方污名。综上，本研究提出了以下命题。

命题 6：媒体信息会影响地方污名的形成过程。

命题 6a：地方性冲突事件发生后，自媒体的报道时间越早，越容易诱发公众对地方的负面刻板印象，从而赋予地方污名。

命题 6b：相对于客观性报道，故事性报道更容易诱发公众对地方的负面刻板印象，从而赋予地方污名。

4 理论建构

本研究根据地方被污名化引致地方形象受损以及地方相关群体身份受损的现实情况，并以流动性视角作为透镜提出了地方污名形成机制的研究构想。本研究突破了以往地方污名研究重结果、轻过程的研究导向，划分与地方绑定的冲突事件的具体类型，重点考察了这些地方性冲突事件引致地方污名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本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去剖析地方污名的形成原因，也为地方污名的实证研究指明了方向。本研究的理论建构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1）本研究构建了流动性视角下地方污名的形成机制，揭示了地方刻板印象在地方污名形成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并进一步明确了地方污名的社会认知过程的边界条件。具体而言，本研究发现地方性冲突事件会激发社会公众对地方的负面刻板印象，从而依据地方性冲突事件的类型赋予地方相应的污名。换言之，地方污名是由于地方频繁发生某种或多种地方性冲突事件，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地方的道德评价，这些评价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社会认知，从而造成了地方形象及其相关群体地位受损的结果（Link & Phelan, 2001; 黎耀奇 等, 2022）。当然，并非所有地方性冲突性事件都会造成这种影响，本研究重点考虑了地方特征（如地方经济水平、地方多元性）和媒体报道（如媒体类型、叙事方式）所带来差异化结果。本文所提出的研究构想为探讨地方污名的形成原因及条件指明了方向。

（2）本研究基于流动性视角，揭示了地方刻板印象的信息流动在地方污名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地方污名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大多数研究都是集中在讨论地方污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上（如 Wacquant et al., 2014; Tyler & Slater,

2018; Tran et al., 2020）。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引起学界与业界的重视，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回答地方污名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一个过程性的研究问题。有小部分研究尝试去阐述地方污名的形成原因，如 Sisson（2021）所总结的，地方污名是由于被污名化的群体集中在某一区域。不可否认，这给地方污名的产生提供了一些合理的解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诠释地方污名的形成原因。本研究从流动性视角出发，认为人口迁移和信息流动是地方污名产生与加剧的重要因素，这为解释地方污名的形成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3）本研究识别了与地方绑定的冲突事件的类型，并依据此对地方污名进行了类型划分。Zhang 等（2021）提出污名这个主题针对不同的对象可以分为个体污名、组织污名、地区污名等形式，而探索污名的具体类型是加强对污名认识与理解的基础。Goffman（1963）将个体污名划分为身体污名、性格污名与部落污名三种类型，Hughes（1962）将职业污名划分为身体污名、社交污名与道德污名三种类型，Hudson（2008）将组织污名划分为核心污名与事件污名两种类型，但暂未有研究划分出地方污名的类型。这限制了地方污名研究的发展，使得已有研究仍然停留在未进行精细分析的表面叙事阶段（Sisson, 2021），并且相较于其它形式的污名研究来说严重不足。本研究发现地方性冲突事件可以分为社会道德冲突、社会治安冲突、社会环境冲突，由于这是引致社会公众对发生这些事件的地方赋予污名的根源，因而依据此可将所赋予地方的污名划分为道德污名、治安污名与环境污名。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地方污名的本质特征，更是为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索地方污名的形成原因提供了有益见解。

参考文献

陈赛, 严磊, 胡修银, 张艳红, 陈婉仪, 吴博文, 杨林川. (2023). 阶层刻板印象: 后效及其理论解释. *心理科学*, *46*(02), 404–410.

候为刚. (2022). 媒体使用与公众安全感研究. *情报杂志*, *41*(05), 78–85.

季浩, 严进, 国维潇. (2022). 职业污名与离职倾向: 牵连家人污名与家庭卷入的作用. *心理学报*, *54*(02), 182–191.

李航宇, 陆爱桃, 郑爽, 蔡思敏, 胡慧清. (2014). 社会复杂性信念、地位知觉和区域刻板印象的关系: 基于粤港刻板印象的研究. *人力资源管理*, (10), 65–67.

李晓明. (2022). 全球新冠疫情信息传播中的地域污名化现象研究 [Master's thesis]. 黑龙江大学.

黎镇霆, 刘晨. (2022). 观鸟活动的具身体验及其影响：基于流动性视角的研究. *旅游学刊*, *37*(5), 69–79.

黎耀奇, 宋亚亚, 梁斯琪, 张骁鸣. (2022). 导游职业污名的形成机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旅游学刊*, *37*(4), 79–92.

黎耀奇, 邓巧巧. (2023). 旅游污名: 研究进展及展望. *人文地理*, *38*(1), 11–19.

刘必强, 何莽, 黎耀奇. (2022). 地区污名对旅行者负责任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 *旅游学刊*, *38*(12), 26–41.

马凌, 朱竑, 王敏. (2019). 重返"物质": 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消费研究及进展评述. *人文地理, 34*(3), 44–52+82.

钱俊希, 安宁. (2021). 全球文化转变的理论背景与方法论框架——兼论中国文化的跨国实践. *地理研究, 40*(11), 3103–3117.

施诚, 倪娜. (2020). 西方学术界重大传染病起源地研究的歧见和偏见——以黑死病、美洲天花、梅毒和 1918 年大流感为例.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5*(6), 181–188+203–204.

宋璐瑶. (2020). 东北地域媒介形象污名化元素及其对策研究 [Master's thesis]. 厦门大学.

孙九霞, 周尚意, 王宁, 朱竑, 周大鸣, 甄峰, 刘行健, 杨晶晶, 陈敬复, 杨茜好. (2016). 跨学科聚焦的新领域: 流动的时间、空间与社会. *地理研究*, *35*(10), 1801–1818.

孙国辉, 梁渊, 李季鹏, 鲁梦宇. (2019). 社会认知理论视角下区域刻板印象的形成机制研究——基于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的数据分析.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1), 118–128.

田瑾. (2017). 新媒体环境下新闻报道如何坚持客观性原则——以反对“天价彩礼”报道为例. *传媒*, (19), 65–67.

王红丽, 李振, 徐光毅. (2022). “矛盾” 视角下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矛盾职业认同形成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30*(11), 2405–2413.

王祯, 杨丽娴. (2018). 刻板印象提升与刻板印象促进. *心理科学进展*, *26*(7), 1264–1271.

王祯, 管健. (2021). 积极刻板印象会产生消极影响？. *心理科学进展*, *29*(9), 1657–1668.

王祯, 管健. (2024). 性别刻板印象的变与不变？来自内容、方法与影响的证据. *心理科学进展*, *32*(6), 939–950.

严鹏. (2023). 中国移动互联网服务不平衡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进. *统计与决策*, *39*(14), 51–56.

尹铎, 蔡慕言, 梁金多, 朱竑, 高权. (2019). 广州城市流浪乞讨者的空间管治与日常生活实践. *地理科学*, *39*(3), 450–458.

游家兴, 陈志锋, 肖曾昱, 薛小琳. (2018). 财经媒体地域偏见实证研究. *经济研究*, *53*(4), 167–182.

张光磊, 黄婷, 殷向洲. (2022). 非体面工作者职业污名的作用机制及其应对策略. *心理科学进展*, *30*(3), 703–714.

张明, 穆妍, 章玉琪, 孔亚卓. (2020). 污名化对被污名个体人际互动的影响. *心理科学进展*, *28*(9), 1564–1574.

张彤, 韦鸣秋, 龙潜颖. (2023). 流动性视角下大众旅游者第一居所意义——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人文地理*, *38*(5), 172–179.

朱竑, 张博, 马凌. (2019).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研究: 议题与展望. *地理科学*, *39*(1), 1–11.

Adey, P. (2017). *Mobility*. Routledge.

Andersen, M. M., Varga, S., & Folker, A. P. (2022). On the definition of stigma. *Journal of Evalu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28*(5), 847–853.

Ashforth, B. E., & Kreiner, G. E. (2014). Dirty work and dirtier work: Differences in countering physical, social, and moral stigma.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0*(1), 81–108.

Baiocco, R., Pistella, J., & Morelli, M. (2020). Coming out to parents in lesbian and bisexual women: The role of internalized sexual stigma and positive LB identi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609885.

Best, R. K., & Arseniev–Koehler, A. (2023). The stigma of diseases: unequal burden, uneven declin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8*(5), 938–969.

Boysen, G. A., Chicosky, R. L., Rose, F. R., & Delmore, E. E. (2022). Evidence for a gender stereotype about psychology and its effect on perceptions of men's and women's fit in the field.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2*(4), 485–503.

Bush, J., Moffatt, S., & Dunn, C. (2001). 'Even the birds round here cough': Stigma, air pollution and health in Teesside. *Health & Place*, *7*(1), 47–56.

Cairns, K. (2018). Youth, temporality, and territorial stigma: Finding good in Camden, New Jersey. *Antipode*, *50*(5), 1224–1243.

Chakrabarty, D. (1991). Open space/public place: Garbage, modernity and India. South As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14*(1), 15–31.

Charlesworth, T. E., & Banaji, M. R. (2022). Patterns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stereotypes III: Long–term change in gender stereotyp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3*(1), 14–26.

Conradson, D., & McKay, D. (2007). Translocal subjectivities: Mobility, connection, emotion. *Mobilities, 2*(2), 167–174.

Datta, A. (1973). 'Contradiction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In *Perspectiv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82–96). Palgrave Macmillan UK.

Durand, R., & Vergne, J. P. (2014). Asset divestment as a response to media attacks in stigmatized industr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6*(8), 1205–1223.

Essien, I., & Rohmann, A. (2024). Space - focused stereotypes of immigrant neighbourhood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3*, 2100–2120.

Feng, W., Liu, Y., & Li, D. (2022). Emotional or rational? The congruence effect of message appeals and country stereotype on tourists' international travel intention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95*, 103423.

Gershman, S. J., & Cikara, M. (2023). Structure learning principles of stereotype change.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30*(4), 1273–1293.

Goffman E. (1963). *Stigma: Notes on a spoiled identity*. Jenkins, JH and Carpenter.

Graham, L. F., Padilla, M. B., Lopez, W. D., & Stern, A. M. (2016). Spatial stigma and health in postindustrial Detroit.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of Community Health Education*, *36*(2), 105–113.

Greiner, C., & Sakdapolrak, P. (2013). Translocality: Concepts, applications and emerging research perspectives. *Geography Compass*, *7*(5), 373–384.

Guo, X., Wu, S., Tang, H., Li, Y., Dong, W., Lu, G., ... & Chen, C. (202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igma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people with diabetes: a meta–analysis. *BMC Psychology*, *11*(1), 242–242.

Harries, B., Byrne, B., Rhodes, J., & Wallace, S. (2019). Diversity in place: Narrations of diversity in an ethnically mixed, urban area.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5*(17), 3225–3242.

He, M., Liu, B., Song, Y., Chen, Y., & Su, X. (2022). Spatial stigma and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s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elf–verification.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42*, 100959.

Hernandez, M., Avery, D. R., Tonidandel, S., Hebl, M. R., Smith, A. N., & McKay, P. F. (2016). The role of proximal social contexts: Assessing stigma–by–association effects on leader appraisal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1*(1), 68–85.

Hoff, M. (1998).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Studies in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CRC Press.

Keene, D. E., & Padilla, M. B. (2010). Race, class and the stigma of place: Moving to "opportunity" in Eastern Iowa. *Health & Place*, *16*(6), 1216–1223.

Kelaher, M., Warr, D. J., Feldman, P., & Tacticos, T. (2010). Living in ‘Birdsville’: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neighbourhood stigma on health. *Health & Place*, *16*(2), 381–388.

King, D. D., Lopiano, G., & Fattoracci, E. S. (2024). A stigma–conscious framework for resilience and posttraumatic change. *American Psychologist*, *79*(8), 1155–1170.

Leeds, D. E., Pansters, W., Rozema, R., Rodgers, D. D., Moser, C., McIlwaine, D. C., ... & Briceno–Leon, R. (2008). *Fractured cities: social exclusion, urban violence and contested spaces in Latin America*. Bloomsbury Publishing.

Levin, S., & van Laar, C. (Eds.). (2006). *Stigma and group inequality: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Erlbaum.

Li, Y., Liu, B., Zhang, R., & Huan, T. C. (2020). News information and tour guide occupational stigma: Insights from the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35*, 100711.

Link, B. G., & Phelan, J. C. (2001). Conceptualizing stigma.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1), 363–385.

Liu, S., Liu, P., Wang, M., & Zhang, B. (2021). Effectiveness of stereotype threat interventions: A meta–analytic review.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6*(6), 921–949.

Liu, F., Deng, H., Hu, N., Huang, W., Wang, H., Liu, L., ... & Li, Y. (202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stigma and quality of life in long–term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5*, 1366030.

Loury, G. C. (2003). Racial stigma: Toward a new paradigm for discrimination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2), 334–337.

Loyd, J. M., & Bonds, A. (2018). Where do Black lives matter? Race, stigma, and place in Milwaukee, Wisconsin.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6*(4), 898–918.

Lu, Q., Mihalik, B. J., Heere, B., Meng, F., & Fairchild, A. (2019). Media effect on resident attitudes toward an Olympic bid.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9*, 66–75.

Magee, C. S., & Massoud, T. G. (2011). Openness and internal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8*(1), 59–72.

Makki, M., & van Vuuren, K. (2017). Place, identity and stigma: Blocks and the ‘blockies’ of

Tara, Queensland, Australia. *GeoJournal*, *82*(6), 1085–1099.

McCombs, M. E., & Shaw, D. L. (1972).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2), 176–187.

Mohd Yusoff, M. Z., Hamzah, A., Fajri, I., Za, T., & Yusuf, S. M. (2022). The effect of spiritual and social norm in moral jud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and Youth*, *27*(1), 555–568.

Motro, D., Evans, J. B., Ellis, A. P. J., & Benson, L. III. (2022). Race and reactions to women's expressions of anger at work: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the "angry Black woman" stereotyp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7*(1), 142–152.

Ocampo, A. C. G., Chen, Y., Restubog, S. L. D., Wang, L., & Decoste, A. (2023). A cross–lagged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igma and job effectiveness among employees with HIV.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8*(6), 889–904.

Paton, K., McCall, V., & Mooney, G. (2017). Place revisited: Class, stigma and urban restructuring in the case of Glasgow's Commonwealth Game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5*(4), 578–594.

Pearce, J. (2012). The 'blemish of place': Stigma, geography and health inequalities. A commentary on Tabuchi, Fukuhara & Iso.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75*(11), 1921–1924.

Puckett, J. A., Maroney, M. R., Wadsworth, L. P., Mustanski, B., & Newcomb, M. E. (2020). Coping with discrimination: The insidious effects of gender minority stigma 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76*(1), 176–194.

Pinkster, F. M., Ferier, M. S., & Hoekstra, M. S. (2020). On the stickiness of territorial stigma: diverging experiences in Amsterdam's most notorious neighbourhood. *Antipode*, *52*(2), 522–541.

Reed, J. S. (1991).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regional stereotypes of southern college students, 1970–1987. *Sociological Spectrum*, *11*(4), 369–377.

Schuster, L., & Majidi, N. (2015). Deportation stigma and re–migr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1*(4), 635–652.

Slater, T., & Hannigan, J. (2017). *Territorial stigmatization: Symbolic defama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metropolis. SAGE Publications.

Sisson, A. (2021). Territory and territorial stigmatisation: On the production, consequences and contestation of spatial disreput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5*(4), 659–681.

Spencer, S. J., Logel, C., & Davies, P. G. (2016). Stereotype threa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7*, 415–437.

Tran, E., Blankenship, K., Whittaker, S., & Fuller, C. M. (2020). My neighborhood has a good reputation: Associations between spatial stigma and health. *Health & Place*, *64*, 102392.

Tyler, I., & Slater, T. (2018). Rethinking the sociology of stigma.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6*(4), 721–743.

Verdouw, J., & Flanagan, K. (2019). 'I call it the dark side': Stigma,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disadvantaged neighbourhood. *Urban Studies*, *56*(16), 3375–3393.

Wacquant, L., Slater, T., & Pereira, V. B. (2014). Territorial stigmatization in ac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6*(6), 1270–1280.

Yan, X. Y., Wang, W. X., Gao, Z. Y., & Lai, Y. C. (2017). Universal model of individual and population mobility on diverse spatial scales. *Nature Communications*, *8*(1), 1639.

Zay Hta, M. K., Ting, R. S. K., Goh, P. H., Gan, Q. H., & Jones, L. (2024). A systematic review on the cultur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tigma during pandemics. *Current Psychology*, *43*(14), 12938–12969.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patial stigma from the mobility perspective

LI Yaoqi, ZENG Xinying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519082, China）

Abstract: Spatial stigma is a recurring phenomenon that seriously damages the image of places and the well–being of related groups, hindering social equality, harmony, and stability. Most studies have used storytelling narratives to explain spatial stigma, but it is not clear why

and how spatial stigma is formed. This study proposes a research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patial stigma based on the mobility perspective, with place stereotypes at the core. Specifically, the study first categorizes spatial stigma based on local conflict events into three types: moral,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and then constructs the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local conflict events on spatial stigma by revealing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factor mobility in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spatial stigma.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study will help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spatial stigma, supplement the research gaps i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patial stigma in the existing studies, and provide references and suggestions to alleviat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spatial stigma popularization.

Keywords: spatial stigma, negative stereotypes, mobility, story narrative